

1007

揚州文史資料



10

揚州文史資料

扬州文史资料

第 10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扬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1年1月



扬州文史资料(总第10辑)

编辑出版：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承印单位：邗江印刷厂

批准书号：(JS)3232

出版日期：1991年1月

开 本：大32开

印 数：3000册

字数：175,000

定价：3.00元

扬州文史资料第十辑目录

扬州人物

- 朱东润教授的生平与学术.....蒋 凡 王国安 (1)
一代小说名家毕倚虹.....李为扬 (15)
周谷人先生传略.....周岳年 (26)
篆刻大师蔡易庵.....蔡文锦 (32)
扬州老报人马二先生.....凌君钰 (37)
忆程善之先生.....袁义勤 (40)
李鼎先生及其哲嗣.....陈 沣 (43)
徐公美生平事略.....徐 恂 (48)
怀念父亲吴索园.....吴 湘 吴 湜 (51)
近代扬州名中医杜子良.....顾一平 (56)
郭坚忍女士轶事.....陈 沣 (61)
周岫芝和他的题谜诗.....李保华 (71)
扬剧琴师娄建秋.....段世荣 (76)
盛成教授九一生辰诗.....盛 如 (78)
杰出的女词人丁宁.....蔡文锦 (84)
悼念女词人丁宁.....章嘉乐 (89)
《还轩斋》感怀.....杨 堤 (95)
名人盛赞丁宁词.....张德煦 (99)

缅怀领袖

- 我在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沙克遗稿 (103)

回忆见到毛主席的情景.....陈有才 (109)

革命斗争

忆扬州地下学联的革命斗争.....唐家实 (111)

我所知道的陈文部队.....茅少卿 (122)

扬州妇女会营救施剑翘的通电.....汤杰 (152)

教育春秋

私立扬州震旦中学史事追述.....彭海 查克彦 江家齐 (155)

扬州中学求学记.....唐之准 (163)

商业金融

扬州盐商及湖南会馆.....唐之准 (173)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扬州货币.....张南 (178)

扬州的典当业.....许明 (183)

扬州典当见闻录.....牧翁 (192)

扬州的会馆.....李寅 (196)

老店史话

我所知道的富春茶社.....吴白甸 (199)

扬州穆斯林首创的鸡鸭店.....金至良 (205)

掌故民俗

唐住在扬州的少数民族姓名简介.....钱传仓 (209)

扬州教场往事谈.....汤杰 (212)

扬州的影剧院游乐场和书场.....刘一飞 口述 (225)

陆声洪 整理

扬州花鼓戏的兴起	韦 人	(238)
杨庙“七心会”	赵瑞智	(242)
扬州的旧婚俗礼仪	赵学礼 口述	(247)
	曹永全 整理	
马子·马子菜	马四龙	(257)

古城琐议

也谈邗国	钱传仓	(260)
邗国不是干国	钱传仓	(262)

朱东润教授的生平与学术

蒋 凡 王 国 安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六日，上海市文联大厅传出阵阵的欢声笑语，温暖的感情交流，融化了初冬的一丝寒意。这时，复旦大学为庆祝朱东润教授执教及从事著述七十周年而举行的纪念会正热烈地进行着。年届九十而精神矍铄的朱先生端坐正中，凝视着来自各条战线的许多新、老学生，倾听着种种发自肺腑的诚挚心曲，不禁想起古人所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股温暖的暖流在胸中激荡。在生活的炼狱中，先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以其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终于看到幸福的今天。“只要是中国人，活着就应该向前，向前，永远向前！”这是政治家的号召，还是演说家的鼓动？都不是。这是先生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主任，在五十年代向入学新生发出由衷的誓言。在振兴中华的艰难斗争中，先生永远搏击进取，为人民留下了一串串不可磨灭的永远向前的足迹。

朱东润教授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和书法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自成一家之言，是他的治学特点，很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现在让我们沿着他留下的足迹，作个简单的历史回溯。

朱东润先生，江苏泰兴人。出生于公元一八九六年。原名世溱，后以字行。泰兴朱氏，原是一个书香门第，但至其祖父辈已趋式微，父亲只是一个失业的店员。但家境的清寒，环境的压

力，反而促使有志青年奋发上进，努力攻读。朱东润先生就是如此。他自幼刻苦勤奋，好学深思，知识广博，为同窗中之佼佼者。因此而得到老师唐文治的赏识和器重。唐先生在训海学生时，常以箠击凡，曼声长吟：“文学要问朱世溍。”这对一个年少气盛的学生，既是激励，又是鞭策。先生于一九一三年以留英俭学会的安排到英国留学，攻读英国文学。深厚的古文底子和广泛的西方见闻，对他后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九一六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回国，次年步入教育界，到梧州担任广西第二中学的外语教师，时年仅二十一岁。二十三岁调到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任教。就在这一年，先生结了婚，生活有了贤内助，读书作文有了第一读者，当然幸福；但大家庭外又添加小家庭，在旧社会中，双重包袱，负担加大，生活也就更加清苦。但先生居陋室而不改其乐，仍然读书不辍，并能结合教学体会，写了十几篇具体讨论外语教学法的文章，连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杂志上。此事先生早已忘却，但复旦大学外文系的葛材梨教授却记得清楚，颇受影响。一九二九年四月，先生被武汉大学聘请为外语教师，自此登上大学讲坛，但暂时还与中文系无缘。后来，经过闻一多先生的努力，才逐渐把立脚点移到中文系的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科研上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的闻一多教授是武大文学院院长，他的思想比较开放，能动脑筋，对中文系那套陈旧的教学早致不满，总想多少来点变动。朱先生到武汉大学任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作为“掺砂子”而到中文系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课程的。

在武大期间，先生因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而由外语教师转为中文系教师，又因编写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作教材，确定了教授职称。当时先生才三十几岁。《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后交由开明书店出版。在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过程中，先生又结合了教学体会，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写了近十篇

专门论文，发表在武大的《文哲季刊》上，后结集成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论集》。

在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先生不断加强基础，开拓思路，注重经、史、子、集及外国文学理论的广泛阅读及材料的搜集工作，成为一个既有理论指导，更重史料实证功夫的文史并茂的专家学者。先生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来源主要出于《诗经》和《楚辞》，因此，决心从基本功做起，好好从《诗经》读起。于是他先从《诗经》开篇的《关雎》开始，读遍汉儒今文学派的鲁、齐、韩三家诗说及古文学派的毛诗家诗说，而后再就郑笺，孔疏及宋儒和明清以来近代学者的说法，加以一番比较研究，从而得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当时的苏雪林知道后，惊叹道：“啊呀，那么哪一年可以读完呢！”但先生吸收传统方法中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精神，和西方理论的灵活原则，取扬雄博览群书而明其大义，“训诂通而已”的态度，终于有所突破，写出一本颇具特色的《读诗四论》。后来，先生更向史学方面作纵深发展，以便为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于是在一九四一至一九五〇年这十年中，陆续写了《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三部书。其中《史记考索》已正式出版；《汉书考索》只完成了三篇；《后汉书考索》写好后，由于种种原由，暂时尚未出版。这三部书中，为什么先生比较偏爱的是《后汉书考索》？如果明白了为什么，那么从学术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先生的为人。《后汉书》是一部特殊的著作。范曄作书时，已有许多有关后汉书时代的历史著作完整地保存着，他多就诸家撰录抄撮成篇，有时甚至还要抄错。因此，从史料上看，《后汉书》并没有多大的贡献。但范曄为什么非常自负地说《后汉书》“比方班氏所作（凡按：即班固《汉书》）非但不愧之而已”呢？这是因为他作书时有宏伟的理想和坚强的信念在支持着。他作书的宗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古为今用”，写的是

后汉，但心目中却是为了现存的东晋。他认为后汉之所以乱而不亡，皆出于仁人君子之力。因此，他认为要振弊起衰，挽危图存，就必须有像李固、杜膺、范滂、郭泰一类的人物出现。刘宋篡晋后，就是一味地杀、杀、杀，在南北朝时代杀了个昏天黑地，范曄本人也是在此情况下被杀的。光靠杀人，能解决问题吗？不能。要振兴中华，还得靠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从学术研究中，我们可以明白先生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想与抱负。作为一个爱国的正直学者，先生是有所为也有所不为的。先生回忆年青时发生在上海滩的一件事，至今仍然愤慨不已。大概是在清末民初，英籍犹太富翁哈同因贩毒及投机生意而称富上海，他作寿时，大摆威风、异想天开，一定要中国科举中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人给他祝寿，报酬是每人一千大洋。没想到他的卑劣目的居然达到了。一讲到此事，先生记忆犹新，不禁拍案痛斥无耻。他说“为了金钱而无脸而见祖宗，这还算什么中国人！文人无耻，至此无以复加。”于此可见终其一生的耿耿爱国之心。这种凛然的民族正气同样充分体现于学术之中。特别是先生所专注著作的中国传记文学的创作及理论研究方面。事实将会证明，先生绝不是钻进故纸堆中而出不来的人。

大约是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先生逐渐把研究的重点移到中国的传记文学的理论及创作上来。如先生本人所说：“对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当时武汉大学内迁到四川，图书条件很差，但先生没有畏葸不前。他开始埋头“下死功夫”，从头做起，从精读《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入手，对魏晋六朝的“别史”做了大量寻幽探微，钩玄撮要，辑佚整理的工作，认真探讨了唐宋作家所作的碑志，墓铭，行状等类作品在我国古代传记中

的价值，并弄清了元、明、清三代在“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所作所为。与此同时，又致力于探究西方（尤其是英国）传记文学的特点。他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当代作家的著作；从提阿梵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叙总论》。举凡在当时武大图书馆能找到的英文传记和传记理论，他都一一研读。经过对中、西传记文学的认真比较，他在理论上先后写下了《中国传叙文学底进展》，《传叙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叙文学与人格》等论文和长达十余万字的专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等。这些成果，阐述了我国古代传记的来龙去脉，填补了我国传记研究的空白，也为他自己从事传记文学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先生认识到，正如佛家所说：

“阅尽他宝，终非己物”，单靠称述古人或洋人，是谈不到什么创造，更谈不到继往开来。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但先生又添加了一句：“乐之者不如作之者”。他很明白，在自己没有动手去做的时候，是谈不到真正的“知”，更谈不上“好”和“乐”，于是他努力从事于中国传记文学的“斩伐荆棘”的实践工作。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的将近半个世纪中，先后写就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和《陈子龙和他的时代》。其中，除《王守仁大传》因故手稿亡佚外，其余五部均已出版。在中国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创作方面，先生的开创之功，永远值得人们纪念。大概因为他是数十年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科研的专家，因此他的传记文学创作所选择的传主都是古人。但先生并没有抱残守缺为古而古，传主的选择，正可见出先生热爱中华，热爱人民的浩然正气。如写《张居正大传》，主要是因抗战关系，想到要救中国，就必须具有象张居正这样不辞艰苦，为国献身的精神。先生回忆说：

“这时正是一九四〇年左右，中国正在对日帝国主义进行艰

苦抗战。我只身独处、住在四川乐山的郊区，每周得进城到学校上课，生活也很艰苦。家乡已经陷落了，妻室儿女，一家八口，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决心把研读的各种传记，作为范本，自己也写出一本来。我写谁呢？我考虑了好久，最后决定了明代的张居正。第一，因为他能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拯救出来，为垂亡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的寿命。第二，因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当时人的唾骂，终于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缺点，他是唯一能够拯救那个时代的人物。”

正因为有这股不可抑制的爱国正气的荡激，于是先生意味深长地在《张居正大传》中写下了中华儿女为祖国为民族而献身的悲壮一幕作为结束语：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底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祖先的时候，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民族自由而奋斗，为民族发展而努力，乃至为民族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张居正大传》出版后，很有影响。从有了一本之后，先生的传记文学作品就一本接一本地诞生。继《张居正大传》，先生深入一步地想到明代王阳明那扫除陈言，即知即行的努力，这对抗战中的中国，不正是有益的借鉴？因此，先生决心继写《王守仁大传》。当时的四川，借书、抄书都极端困难。但先生“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写成了《王守仁大传》。但因处于抗战时期，开明书店的出版能力衰退了，书的出版一时成了问题。书不能出版，犹如母亲看到自己的亲生婴孩没奶吃一样，其苦恼是可想而知的。一九四六年，那家一时蒸蒸日上的正中书局曾派人找上门来，接洽出版事宜。辛勤的劳

动成果能够和广大读者见面，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呢？可是，先生却拒绝了。原来，先生知道，正中书局乃是国民党官方资办，同中统头目陈立夫、陈果夫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不愿自己的著作交给这样一个出版社去出版，而“宁愿交给老鼠去批判”，表现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应有的骨气与风节。以后这部书稿就这样留在泰兴老家。解放后，先生的一家人都出来到了上海，书籍手稿仍留在家乡，此后家中又来了许多不速之客。十年文革期间，更是经历一场浩劫，性命虽是侥幸保住，但《王守仁大传》的手稿却从此不翼而飞，踪影全无。总之，昂扬的时代精神，对中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关心，是先生学术的精髓。先生不仅是专家，而且首先是个爱国者。

抗战中的武汉大学，学术的宗派性仍然很强。因此而影响到人事安排。叶圣陶也被当权者以请假条“文字不通”为由而解聘。事虽荒唐，但却是真实的。朱先生这样非武大宗派中人，当然也很难立脚。一九四二年后，先到重庆，后回到南京中大任教，也因非中大嫡系而被排挤出。于是先后辗转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江南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等。解放后的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于是转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而从1957年起，兼中文系主任，后为名誉系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他还担任过国务院第一届学位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华文史论丛》主编。1988年2月10日不幸病逝，享年92岁。

朱东润教授的一生，既保持了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刚直守正，以道德立身，以天下为己任的节操，也体现了追求真理，注重科学的精神。早在1916年他就曾在上海创办报纸，反对袁世凯称帝，为自由民主而呐喊。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愤然离开沦陷的家乡，绕道东南亚，远赴重庆，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斗争。解放以后，他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学术文化建设。“文革”

中，他历经患难，始终不为邪恶势力所屈服。粉碎“四人帮”后，先生以84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表明了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信念。朱教授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东润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了众多的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学术特点和主要贡献是：

第一，经、史研究方面。先生认为，作为一个古典文学工作者，必须具有经、史方面的深厚基础。对于经、史如果一窍不通，那就无法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特点，更谈不上对士大夫生活习俗，文化心态的了解。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了解中国的士大夫出身的作家，那么所谓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就只是一句空话。因此，为了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博大精深，先生先后写出了《公羊探故》，《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诸书。这些论著，以对原始材料的充分把握为基础，阐幽发微，独抒己见，颇多精湛之论，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称誉。

第二，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读诗四论》，《楚辞探故》，《左传选》，《陆游研究》，《陆游选集》，《梅尧臣诗选》，《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等。另外还在六十年代主编凡六册二百万言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作为大学文科教材，影响巨大。它虽是集体著作，但先生总其成，审稿时日以继夜，一丝不苟，但又不囿己见以束人手脚，善于发挥各位作者的长处，因此全书既有统一体例，又处处闪烁着集体智慧的光彩。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中，此部著作颇有参考价值。在个人著作方面，也是很有特点的。先生既不囿于传统偏见，又不被时人的时髦说法所束缚，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是其一贯作风。如抗战初期出版的《读诗四论》（解放后增加《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一篇。以《诗三百篇探

故》之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有的见解就与古今的学者很不相同。他写此书，是有鉴于古人“知有经而不知有诗”，近人又“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他以客观的分析态度认为《诗经》三百篇不是民间作品，不但雅、颂不是，连风诗也不是。一般论诗，从古代的经师到近代的文学史专家都认为风诗是民间的著作，特别是那些谈情说爱的，一定是民间的作品。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这种见解成了定向思维，谁也不敢超越雷池一步，往其他方面去想。先生则不然，他勇于打破传统偏见。他说：“民间要谈情说爱，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不是说士大夫乃至封建主就不要谈情说爱了。照我的认识，民间的谈情说爱，还是有一定节制的，到了奴隶主或是向封建主过渡的奴隶主，那就没有限制了。晋惠公烝于贾君；晋文公纳怀嬴；宋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这些奴隶主什么事做不出来！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谈情说爱的事都要由民间负责呢？何况这个‘民’字，象征着一个带了镣索的人，他不知命在何时，当然既是有生命的动物，他不会没有传宗接代的潜意识，但说他的爱人是“将翱将翔，佩玉琼琚”，那真如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对于具体论述，还可作深入探讨，但从反思中打破定向思维的传统框框，这种见识的发表，绝不仅仅是怀疑，而是怀疑之中见创新，是一种学术研究中的创造性思维。它的真正价值在此。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必须具有创造性的思维，以便在阐述史实的基础上发明创新，发扬光大。不敢接受怀疑与挑战而作单一不变的定向思维，是会把学术引向穷途末路的。

第三，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以及学术专论《沧浪诗话探故》，《梅尧臣作诗的主张》，《黄庭坚的论诗主张》诸文。他在三十年代初期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一书，以中国历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为线索，提纲挈领，系统论述了中

国古代文论的精萃，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开拓性著作之一，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至今仍然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家，占有重要的地位。朱自清先生曾誉之为我国“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参见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一文）。在《自序》中，先生说明此书不同于其他的特点：一是章目里只见无数的人，而不见时代和宗派。虽然有关时代及流派的问题，先生也加以论述，但为什么不特别标帜出来呢？先生说：“我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这是一个矛盾，然而人生本来是矛盾的。……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的指导。宗派会有固定的规律，甚至也会有因袭的恩怨，然而伟大的人生常会打破这些不必要的规律和不可理喻的恩怨。”一是对于每个批评家，常把论诗和论文的主张集中概括论述，所以书中所见，常常是整个的批评家，而不是每个批评家的多方面的组合”。三是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也就是他所说的“应当根据远略近详的原则，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要的叙述”。总之，先生此书，在史的叙述里，尽力排除主观的判断；但写史必受作者史观的制约，作者的观点立场不能不产生影响，先生是在微观事实的基础上，加以宏观的理论概括。这种研究方法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例如书中叙盛唐以后的诗论，“大都可分两派。一，为艺术而艺术，如殷璠、高仲武、司空图等。二，为人生而艺术，如元结、白居易、元稹等。大抵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者，其论发于唐代声华文物最盛之时，如殷璠是；或发于战事初定，人心向治之时，如高仲武是；或发于离乱既久，忘怀现实之时，如司空图是。惟有在天下大乱之际，则感怀怅触，哀絃独奏而为人生而艺术之论起：元结于天宝之乱，故有《篋中集序》；元白在元和间，目睹藩镇割据，国事日非，故有论诗二书。”其论言简意赅，读来饶有滋味。至于《司空图诗论综述》

一文（见于《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又能从时代、现实及其流变入手，以慎思明辨的高瞻远瞩的眼光，从具体史实而至于宏观概论，确乎独具慧眼。如引表圣《白菊杂书》等诗：“黄鹂啖处谁同听，白菊开时且剩过。漫道南朝足流品，由来叔宝不宜多！”以为“浮世荣枯，在表圣固可不计，而生民之艰苦、国事之危疑，则一日不能去怀”。晚唐乱世，正是其二十四《诗品》产生的社会基础。所以他出言不同凡响，与众迥异，以为“《诗品》一书，可谓为诗的哲学论，对于诗人之人生观，以及诗之作法，诗之品题，一一言及”，并加分列：

一、论诗人之生活：疏野、旷达、冲淡；

二、论诗人之思想：高古，超诣；

三、论诗人与自然之关系：自然，精神；

四、论作品 { 阴柔之美：典雅、沈著、清奇、飘逸、绮丽、纤浓；
阳刚之美：雄浑、悲慨、豪放、劲健；

五、论作法：缜密、委曲、实境、洗练、流动、含蓄、形容。

大纲细目，罗罗清疏，所论二十四《诗品》的理论体系，很有识见，很有深度，给人以良好的启迪。

第四：中国传记文学的创作及理论研究方面。这是先生一直为之耕耘不辍的又一学术领域，是他的工作重点所在。其主要著作，前面已作交待，兹不赘述。在这方面，先生从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感出发，借鉴与继承了西方传记文学的有益经验教训和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试验和贡献。在传记文学理论上，不论古今中外，只要有帮助，先生是主张“拿来主义”的，他说：“在中国出生的传记文学的发展既然已有许多曲折，为了求得这类文学的进展，势不能不求助于国外。学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在此路不通的时